

二十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华侨认同嬗变及其影响研究

张小倩

(丽水学院华侨学院华侨文化与教育研究所,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 19 世纪末以后,随着晚清政府侨务政策的改变、知识分子的南下以及革命党人在荷属东印度进行革命宣传,促使当地华侨社会出现“中国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当地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在长期的文化融合后,重新形成较为统一的对主流中华文化的认同。然而,这一时期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的“中国化”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后华侨与友族关系的紧张产生了较为深远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 二十世纪初; 荷属东印度; 华侨; 认同嬗变

[中图分类号] D634.3.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9)03-0069-08

19 世纪末以前,在荷属东印度,除了部分上层华商及荷印政府的华侨官吏与清政府关系较密切之外,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华侨对清政府持消极冷淡的态度。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传播到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之前,当地华侨还未形成“政治中国”的概念,更多持有一种乡土观念和历史文化观念的文化自觉。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随着亚洲的民族觉醒,特别是中国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华侨感觉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这一自豪感随即发展成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同时,华文报刊、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和书报社的建立,促进了荷属东印度华侨学习国语、中华文化。政治和文化的双向推动导致 20 世纪初的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出现了“中国化”现象。

在“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各地华侨以各种形式积极响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捐献资金或发动募捐支援革命斗争,而不像以往只把钱寄往家乡;又如在革命宣传下返回祖国,以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等等,华侨的思想觉悟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并且华侨在荷属东印度广建中华学校、中华会馆等社团和机构,打破了以往以方言为教授媒介的私塾教育,突破以往以家乡和血缘为导向的原生态社会组织,同时创办各种华文报刊,希望透过这些组织、机构和媒介将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导向中国,实现“中国化”。

一、清末时期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的联系

同治以前,清政府在大多数时候严禁人民出国,也颁布诸多禁令限制华侨归国^①。此外,清政府中还存在蔑视海外华侨社会,听任外国迫害华侨而不作为的现象。荷属东印度华侨多因当时中国政府的苛政及生计困难而奔走海外,重乡土而不重国家,清政府的歧视和漠视政策更加深了华侨的这一观念。所以大部分荷属东印度华侨对与清政府发生关系并不很积极,只有少数社会上层华侨如张振勋等位列官职,并在国内进行投资实业等经济活动。

[收稿日期] 2018-06-19; [修回日期] 2019-03-09

[作者简介] 张小倩,福建晋江人,丽水学院华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印尼华族历史与文化。

^①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93 页。

然而,到晚清时期,清政府为了利用华侨资本,发展国内经济,转变了华侨政策。越来越多华侨得到虚职后,从中国购置蟒袍、大褂、朝珠之类,每逢春节、庆典或贺寿时,就穿戴起来^①,以此展示自己在祖国的政治地位。另外,对于此前大多数敌视或漠视清政府的荷属东印度华侨来说,被动接触清政府开始重视华侨的信息和政策,对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程度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前往荷属东印度的知识分子客观上推动了当地土生华人对祖国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如康有为等维新分子对荷属东印度土生华人重新学习且接受祖国语言和文化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由此看来,晚清政府时期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已经出现“中国化”现象的萌芽。

二、二十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政治认同

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南下使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直接出现了“中国化”现象,这一时期爱国思想和中华文化认同在华侨社会广泛传播。

(一)与祖国之间的联系增强

1. 华侨支持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

西方列强侵华后,对中国铁路、矿山权利的疯狂掠夺,对中国财政金融的逐步控制,加之清政府的彻底投降,种种丧权辱国事件加速了广大华侨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同时,孙中山和同盟会在南洋的革命宣传,使华侨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们对革命党宣称建立的新中国产生了政治认同并抱有很大的期望。荷属东印度华侨对这一时期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予各种支持。

(1)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开展舆论宣传

1907年巴城同盟会建立。由于荷兰政府不支持中国革命,为掩人耳目,方便革命活动的展开,同盟会以清朝时期就已存在的书报社为掩饰,以巴城书报社的名义向荷印政府备案^②。随后,书报社在荷属东印度各地纷纷建立,负责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同时联络华侨会党和组织。荷属东印度华侨对建立同盟会和书报社的认同表明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同时也为了吸引更多华侨特别是土生华人参与。

(2)经济支援

筹资资助革命党人在中国的起义、反日活动以及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兴办实业是荷属东印度华侨支持革命党人的另一种表现,也成为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当时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华侨以往将钱财汇往家乡亲人,如今已上升到政治高度,体现出荷属东印度华侨对祖国形成政治认同。例如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华侨捐款共达215 000余元,其中荷属东印度为最多,达9万元,其次为英属各岛达5万元^③。廖承志谈及华侨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财政上的巨大支援时就指出,“孙中山这一批人的财政,完全来自海外华侨的支持……美国和爪哇的华侨对他支持最大。”^④可见荷属东印度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援力度。

此外,民国政府几次颁布提倡兴建实业命令,以宣传海外。随后巴达维亚侨商刘清美、徐商隐即来上海考察各工厂,返荷属东印度后提倡回国兴办实业^⑤。

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荷属东印度华侨展开声援“五四运动”以及抵制日货活动。苏门答腊日里、棉兰华侨所组富华公司代表抵达上海后,赴杭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实业工厂考察、参观,调查国货产品及运输情形。考察结束后即开始采运国货。南洋泗水华侨艺林公司总经理蒋以麟来上海采办国货,所采订货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②《华侨进化》,《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第三册,第96页。

③浪啸《论华侨与祖国革命》,《生活周报》1949年11月16日。

④《海伦·斯诺谈宋庆龄》,《参考消息》1981年5月27日,第2版。

⑤《国货团体欢迎侨商纪》,《申报》(上海)1919年9月9日,第3张,第10版。

物共计百余种^①。

1926年省港大罢工发生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掀起支持和募捐活动。如1926年5月,巴城华校平民夜校的学生们“每日除节省零用费积蓄起来外,工余再向侨胞热心之家募捐。”他们致信国内罢工同胞曰:“我们侨居海外,不能随诸工友们直接向那帝国主义作战,很觉惭愧”;“……现在积有洋毫6000角,即于4月21日由吧城永德钱庄汇上,由海外部转交到,请查收示复为荷。”^②

在革命党人的宣传和民国政府的鼓动下,华侨捐资支持祖国的行动不遗余力,并且改变以往将侨汇寄往家乡的做法,在经济上直接支持祖国。

(3)回国参加武装起义及建立组织参与民国政府政治活动

荷属东印度华侨以回祖国直接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孙中山,这是荷属东印度华侨表达对革命支持的重要方式。如邦加岛华侨胡国梁、柳聘农和李燮和^③,巴城华侨罗福兴等都回国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但袁世凯以清廷内阁总理的身份,企图利用英美等列强对革命党人造成压力,迫使革命派对其妥协。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以总统名义宣布,亲自指挥北伐。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纷起响应。坤甸华侨63人组织了决死队,他们启程回国之日,全埠商店休业欢送^④。华侨基于对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认同,首次展现出不怕牺牲的精神。

民国元年,上海华侨联合会成立,以头两年最为兴盛,华侨也因此取得民国政府参政权。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海外支部代表名单内也包括巴城支部的李国瑞及苏门答腊日里棉兰的代表梁如九^⑤。荷属东印度华侨对祖国政治变动的关切,及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以往所没有的,充分表现了他们对祖国的政治认同。

上述荷属东印度华侨对国内革命予以各种支持的史料表明,革命党人在南洋的宣传及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政治觉悟。此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联系与互动越来越频繁。荷属东印度的土生华人也逐渐转变其认同,不同于以往只表现出对家乡及其文化的认同,如今既持有传统乡土观念,同时也表达对祖国革命政权的支持,以及对新兴国家的认同。不同于晚清时期的较为被动接受,土生华人在这一时期更多地主动关心和推动祖国的前途和发展,出现了“中国化”倾向。如土生华人领袖黄自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新报》关于政治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引发我的求知欲。我逐渐产生想要了解武昌起义的问题,于是我从我哥哥那里学会了唱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国歌《三民主义》……”^⑥黄自达的自白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对当时部分土生华人的思想心态所造成的影响。

与晚清时期荷属东印度华侨普通大众几乎与清政府没有互动相比,此时荷属东印度华侨对祖国革命运动的注目,及其对国内所发生的爱国运动的支持,表明他们的爱国情操及关心祖国命运的感情被激发出来,形成了对“政治中国”的认同。

三、二十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华侨的中华文化认同

(一)华侨社团“中国化”

清末时印尼华侨社会就已建立了部分侨团,有的到现在仍然存在。如雅加达的客属公会等^⑦。这些侨团

①《华侨回国采办国货之忙碌》,《申报》(上海)1919年10月14日,第3张,第10版。

②广东省档案馆等合编:《与侨务史料选编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③④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第337页。

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十三年1月—6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137—138页。

⑥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7页。

⑦中国华侨问题研究会编:《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中国华侨问题研究会,1955年版,第33页。

以籍贯、血缘或宗教为导向,独立经营,属于原生态社会组织。1900年后,中华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等泛华社团在荷属东印度的成立,打破了华侨社团之间的藩篱,推动了华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统一,促进了中华文化教育的传播,将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文化自觉由家乡上升到主流中华文化。使这一时期的荷属东印度华侨实现从“华化”到“中国化”的转变。

1. 中华会馆

1900年巴城中华会馆的成立,标志着侨团活动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中华会馆成立后将活动对象扩大至全体荷属东印度华侨,摒除以往囿于地缘或宗亲活动的局限性,突破籍贯、新客、土生等来源的区别,开始积极推动广大土生华人寻找在自身或者在下一代已经消失的传统中华文化认同,如语言、生活习惯等等。

中华会馆的领导人如李金福、潘景赫、洪水昌等都是土生华人^①。他们旨在改善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并用其发展当地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建立华侨学校,用新式方法教授华文等。正如洪渊源指出,“中华会馆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向华人儿童教授华文并且在华侨中间促进中国文化。”^②而依威尔莫特看来,中华会馆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推动华侨的民族主义意识,消除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侨之间以及各方言群体之间的隔阂。”^③结合史实分析,中华会馆成立的目的就是教育和团结全荷属东印度华侨,抛弃以往区分籍贯和土生、新客的做法,推动全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文化认同导向祖国,实现文化认同一体化。

中华会馆建立以后蓬勃发展,很快就遍布了整个印尼。在短短10年内,印尼各地中华会馆增至400所^④,这足以证明中华会馆在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从而也可推断中华会馆推动当地华侨社会逐渐统一对祖国文化认同的努力取得了成效。中华会馆倡导和普及中华文化,很大程度提高了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民族自尊心,推动了荷属东印度华侨对祖国文化的学习热情,促进土生华人形成对祖国的统一文化认同感。

2. 书报社

20世纪初,随着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南亚宣传革命活动,1907年,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荷属东印度的华侨在巴城小南门(Pintu kecil)成立了第一个同盟会支部。不久,为了掩人耳目,防止荷兰殖民政府的破坏,同盟会改名为寄南社,并开始在荷属东印度各地成立书报社,以便推广革命思潮。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民国建立前的1908—1911年间,荷属东印度的同盟会大致有13个分会,包括巴城分会、三宝垄分会、泗水分会、邦加檳港分会、邦加烈港分会、邦加勿里洋分会、棉兰分会、坤甸分会等等^⑤。

这一时期的荷属东印度书报社一般附属于华校之内,因此书报社多以所属学校冠名。根据印尼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在辛亥革命之后,只爪哇一岛就有80间书报社,其中泗水占了32间,巴城则有13间,西加有书报社47间,其中坤甸39间,山口洋4间^⑥。

书报社不仅提供华文读物,推动中华文化在荷属东印度华侨中的传播和发展,而且讨论国内局势,商讨革命事宜。

(二) 华文学校的创建和发展

二十世纪以前,荷属东印度还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统一的母语,乡土观念在当地华侨社会居于主导地

① Nio Joe Lan, *Riwayat 40 Taon Dari Tiong Hoa Hwe Koan Batavia*, Batavia, 1940, p.202.

② (印尼)洪渊源:《洪渊源自传》,梁英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6页。

③ Donald E. Willmott, *The Chinese of Semarang: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25—26.

④ 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1页。

⑤ 杜永镇:《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3页。

⑥ Kantor voor Chineesche Zaken, *Ars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Batavia BB4379.

位,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教育以祖籍地文化为导向。清朝时期,荷属东印度就有不少私塾,但都属于方言群体所设立的学堂。就学儿童几乎全部为土生华人,只懂得当地话,于是授课时就必须有一个教习担任教课,一个教习担任翻译。例如广肇籍华侨所办学堂,即将土话翻译成广府话,潮州籍华侨所办学堂也如此^①。因此,即使土生华人仍有文化自觉,但孤立的语言和文化系统无法使华侨的文化认同统一,也无法使华侨团结。基于此,部分土生华人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统一全荷属东印度华侨的语言、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并将它们导向中国,促进华侨的团结,开始谋划建立以正音(国语)为授课媒介的新式学校,在文化教育方面开始了华侨从“华化”到“中国化”的转变。

1901年3月巴城中华会馆隶属的中华学堂(学校)就在这种需求下宣告诞生。

中华学校创立之后受到各埠华侨的欢迎,两年内,仅爪哇岛的巴城、文登、茂物、万隆、三宝垄、玛琅、井里汶等地,共创办了13所中华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到1908年荷属东印度的各中华学校达27所。

表1 1908年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埠华侨学校不完全统计

埠名	校名	学生人数
巴城	中华小学堂	370
新巴萨	中华小学堂	48
丹那望	中华日新小学堂	42
文登	中华小学堂	192
岩望	中华小学堂	192
茂物	中华小学堂	82
展玉	中华小学堂	21
剪玉	中华粤兴小学堂	30
绒望	中华小学堂	58
万隆	中华小学堂	96
南安由	中华小学堂	68
井里汶	中华小学堂	151
玛琅	中华小学堂	226
梭罗	中华小学堂	150
三宝垄	中华小学堂	101
普布利我	中华小学堂	45
谏议里	中华小学堂	163
锦石	中华小学堂	105
泗水	中华小学堂	378
抱罗布连俄	中华小学堂	157
欧怡	中华小学堂	50
北加浪岸	中华小学堂	107
西都文罗	中华小学堂	57
苏门答腊巴东	中华小学堂	不详
巴城	中华保良会半夜学堂	不详

资料来源 根据《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第1期,第45页《南洋英荷属岛各埠华侨学校一览表》整理所得。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到 1919 年,中华会馆附属中华学校爪哇、婆罗洲及苏门答腊等处共有 200 余所^①。

中华学校在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中极受欢迎,得到广泛建立,这充分证明祖籍来源不同的华侨企图统一其文化认同倾向于中国的主流文化,而不再局限于以往只遵循各自祖籍地文化传统。因此,中华学校在各地的建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由于忌惮荷属各埠中华学校的建立,荷印政府于 1907 年策划在各埠创建 100 余所学堂,包括公家学校以及专收华侨学生的荷华学校,章程与已办专收欧人学校相似^②。1908 年荷华学校诞生后吸引了一部分富裕华侨和华侨官员将其子女送进荷华学校就读。不过总体来说,在 20 世纪初荷华学校的规模仍无法与华侨学校相比。

表 2 1910—1914 年荷华学校发展情况

单位:所/人

年代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学校数量	17	20	24	24	27
学生人数	2780	3426	4096	4443	5203

资料来源:熊理:《欧战后之华侨教育》,载《教育报》,1919 年 6 月,第 9 页。^③

表 3 1914—1926 年荷属东印度华校统计

单位:所/人

年代	1914	1919	1926
学校数量	148	215	313
学生人数	10 844	15 948	31 441

资料来源: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荷属东印度华侨教育鉴》,1928 年,第 402 页,第 408 页,第 448 页。^④

从荷华学校与中华学校的发展对比表及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荷华学校创立后在学校和学生数量上都有所发展。但是仅从 1914 年荷华学校与华侨学校的对比情况,就可以发现荷华学校的数量和生源远远比不上当时的华侨学校。其中主要原因为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荷属东印度华侨已经形成对祖国主流文化和政治认同,他们仍期待日后能够回国生活,因此认为子女应该学习祖国的语言和文化。

综上所述,1.中华学校的广泛建立和在华侨社会的接受程度,表明荷属东印度的华侨教育体制,从私塾到文化和政治认同都倾向中国的新式教育的转变,从认同当地或祖籍地语言到统一的国语和中华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华化”到“中国化”的转变。2. 荷属东印度华校的数量之所以能保持较快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荷属东印度华侨对祖国产生的政治和文化认同,革命党人的推动以及民国政府的政策。民国政府力图确保这些学校的运营唯政府利益是瞻^⑤。对这一时期大多数荷属东印度华侨来说,内在动力或外在推动力使其“中国化”远远超过了接受“荷化”或“本土化”。

①《爪哇通信(二)》《申报》(上海)1919 年 3 月 15 日,第 2 张,第 6 版。

②《各国教育汇志》《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三年十一册,第 300 页。

③司徒赞:《荷兰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简史》,《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 年第 1 期。

④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辑委员会编:《荷属东印度华侨教育鉴》,荷属华侨学务总会,1928 年版,第 402 页,第 408 页,第 448 页。

⑤徐百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年版,第 314 页。

四、荷属东印度华侨“中国化”产生的影响

(一)对荷属东印度华侨与原住民之间关系的影响

荷属东印度华侨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荷属东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20世纪初,巴城中华会馆的建立给原住民民族主义者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原住民第一个民族主义社团——至善社的建立。

华侨和原住民关系的基调是和平相处,但是双方政治、文化认同的差别和经济竞争使双方矛盾时有发生。

这一时期华侨与原住民能够维持总体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无论原住民还是华侨自身,大部分都将华侨视为中国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不同倾向,使双方都认为华侨与原住民之间的族群认同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华侨支援中国的解放运动也无可厚非。这同时也显示出华侨民族主义者和原住民民族主义者对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原住民所追求的是如何从荷兰殖民政府的统治下争取民族的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而大部分华侨虽然生活在荷属东印度,但由于长期与原住民“分而治之”,而且华侨已经产生了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出现了“中国化”现象,因此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首先表现在希望自己的祖国能繁荣强大起来,当他们在海外受到殖民统治者和当地势力的不公正对待时,强大的祖国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成为他们可靠的后盾。

这种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原住民的华侨观。即使是在民族主义解放运动中的互相支持,华侨在原住民眼里至多只能是“合作者”。因此在他们的建国蓝图中,华侨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这个时期的荷属东印度华侨虽然受到当地文化同化,但没有产生完全“当地化”的意识,而是保持着一系列传统的中华习俗和价值观念,以及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倾向。这使得华侨文化能为原住民认同的因素少之又少,以致难免被视为外来文化,而其持有者即被看作异族人、异邦人。在华侨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荷属东印度华侨的“中国化”,并通过各地中华学校的教育宣传推动这一现象,客观上拉大了华侨与原住民之间在文化及政治认同的距离,并为日后双方关系的紧张埋下隐患。

(二)华侨“中国化”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在华校教育方面,二十世纪荷属东印度各地华校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荷兰殖民当局的猜忌和忧虑。荷印政府担心经过华校教育的华侨,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提高后,将吸引更多土生华人倾向中国,并对原住民的民族主义运动有所启发,对其殖民统治将产生极大威胁。

为此,荷兰殖民当局一反过去不许华侨子女进荷语学校就读的态度,改而采取在教育上分化和拉拢华侨的政策,创办了荷华学校。其目的就是扩大对抗中华学校的力量,削弱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争夺华侨教育的领导权,从而使下一代华侨儿童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逐渐淡薄,疏远自己的祖国,逐渐成为亲荷力量。这一政策如果成功也将自然疏远荷属东印度华侨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造成原住民加深对华侨与荷印政府之间关系的误解,从而达到分化双方关系的目的。

此外,为了更有效管理华侨,荷印政府还颁布国籍法,规定不分种族,凡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的人都具有荷属东印度国籍,华侨子女自不例外。荷印政府在教育与国籍问题上抓紧采取使华侨本土化的政策,说明殖民当局在新的形势下,企图加快使华侨脱离中国影响加速本土化的脚步。事实上,荷印政府的这一举措也可能收到一定的实效。因为这一时期受华校教育的学生,他们被灌输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求热爱祖国、民族平等,接受荷校教育的侨生极易受到荷印政府的教育理念影响,脱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并将其认同转向荷兰。

(三)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产生的三个不同政治派别

在加快同化的同时,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在笼络华侨(尤其是中、上层)、加强对华侨的控制、削弱华侨

的民族意识、分化华侨社会的政治认同和教育理念方面,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不少之前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人物开始倾向荷兰,部分土生华人倾向当地社会,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开始产生分化,形成了以“新报”集团、荷属东印度中华会、印尼中华党等政治团体为代表的不同派别。

结 语

荷属东印度华侨多数是自身或祖辈因在国内受封建压迫剥削被迫出洋讨生活。作为弱国的侨民,他们得不到公正待遇,比欧洲人甚至日本人低一等,他们对清政府只有失望。晚清政府日益衰落、每况愈下,荷属东印度华侨热切希望有人能改变祖国面貌。这个时候革命党人的出现,以及建立新国家的政治宣传吸引了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注意,同盟会和书报社在荷属东印度各地建立,革命思想在华侨社会得到广泛传播,荷属东印度华侨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越来越多的华侨包括土生华人开始产生对祖国的政治认同,出现了“中国化”的现象。

在文化方面,荷属东印度华侨虽然没有文化中国的概念,但是仍秉持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文化自觉,在当地形成了以不同祖籍文化为基础的“华化”的华侨群体。所以在二十世纪以前,土生华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本土化,但是由于本身有着文化自觉,再经过维新分子的推动以及中国新式教育思想在荷属东印度华侨社会的传播,土生华人积极参与建立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中华商会等,突破地缘和方言限制,学习国语和中华文化,团结各界华侨,实现荷属东印度华侨从“华化”到“中国化”的转变。

不过,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印尼华侨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华侨与友族关系、荷印政府对华侨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华侨政治立场的分裂等方面产生了较为深远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对华侨华人与原住民之间关系的紧张埋下了隐患。

(责任编辑:黄文波)

A Study of Identity Evolution of Chinese Indonesians and Its Eff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Zhang Xiaoq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Zhejiang Lishui University, Lishui Zhejiang 323000)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 accompanied with the later Qing government changing its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members of Tong Meng Hui coming to Dutch East Indies, a trend of “sinicization” emerged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Dutch East Indies. This trend of “sinicization” presented as mos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there formed unit political identity and reformed culture identity with China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ntegration. However, this trend of “sinicization” had somehow far-reaching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pribumi”.

Key words: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utch East Indies;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Evolution